

# 三国时期罗阳县的建立

■俞光

瑞安先贤故事会 51



三国时期，全国是从统一转向大分裂、长期混战、百姓痛苦不堪的时期。但就东瓯而言，则又相反，经济是从“草昧蒙翳”转向走上“积极开发”的关键性开创时期。东吴揭开东瓯“二次开发”序幕，为以后东瓯经济社会跨越式大发展奠定基础。瑞安经济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获得重大进步。

## 东吴立国方针

孙策据江东后，东汉建安五年（200），遇刺身亡。孙策去世前委托张昭嘱咐继位的孙权：“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就是要立足江南，对中原局势采取坐观蜀、魏争斗的策略。这是基于对当时局势客观分析而作出的东吴立国总体战略，也是东吴的立国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孙吴对包括东瓯在内的江南采取“积极开发”政策。

对东瓯而言，东吴的“积极开发”政策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秦朝的“羁縻”政策是消极的，汉代的“移民虚其地”政策是破坏性的，而东吴的“积极开发”政策是主动的，它从根本上扭转了统治王朝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发展政策的严重偏差，拨正了东瓯发展的正确方向。

## 平定山越与设立罗阳县

孙吴平定山越从东汉建安元年（196）至东吴赤乌五年（242），历时46年。其中与东瓯有关的战事主要有三次：东汉建安元年，东治、侯官（今福州市）长商升会同山越首领张雅、詹强等起兵为乱，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会稽南部都尉率兵征讨，韩晏为升所败。继任永宁长贺齐又代领会稽南部都尉事，大胜之，商、张、詹等出降。建安八年（203），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山越复起。孙权遣会稽郡南部都尉贺齐率包括永宁县在内的所属各县兵士5000余人进讨，贺大败之，山越首领洪明被杀，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皆降。建安十五年（210），浙南、闽北五县山越在吕合、秦狼的率领下又起事，孙权遣吕岱、蒋钦领兵讨伐，结果吕合、秦狼被擒。

孙吴平定山越采用军事进剿与招抚降附两手并用方法，这在与东瓯有关的战事中都有所体现。对于这些被征服的山越，孙吴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的政策，即强壮的收编为士兵，体弱的划归郡县补户。为了管理这些划归郡县补户的山越人，孙吴在平定山越过程中，在境内增设了一批郡县，其中就有建于吴赤乌二年（239）的罗阳县（后改称安阳、安固，当时境辖今瑞安市、平阳、苍南两县的全部，泰顺、文成两县的大部及龙湾、瓯海两区的一部）。所以说，瑞安县前身罗阳县的设置是孙吴平定山越的直接产物。

孙吴政权主要以江东豪族为统治基础，《三国志》说：“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起初深山间居民并未归附，这就是山越。在东瓯故地，就是当年内迁时“逃逸山林”的越人。这批留下来的原住民，是以后东瓯人的真正始祖。他们居住于地广人稀的山区，经济封闭落后，基本上与世隔绝。《通鉴》称：“山越本亦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对东瓯的错误政策，他们也对孙吴持对立态度。正如《吴书》所述，“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成为孙吴巩固江南的心腹之患。

对于浙闽山越的平定，以往大多论著将其描述和定性为“大规模屠杀”、“残酷的进攻”、“疯狂的进攻”。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更高层次，亦即从是否有利于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东瓯的开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角度，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对东瓯而言，平定山越将山民逼到平地，编户归籍，纳入管理版图，加快了与中原先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客观上为东瓯的开发提供了基础，是积极开发东瓯的起点，揭开东瓯二次开发的序幕。”（俞雄《秦汉和三国孙吴对东瓯的不同政策》）事情确实如此。浙闽山越的平定，是以山越人被杀或被迫为代价的，因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评判这一事件，浙闽山越的平定，既扩大了兵源，又使山越人出山定居，编户入籍，纳入管理体制，有利于浙闽土地的复垦和开发，有利于山越人的繁殖，客观上加快了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而有利于浙闽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浙闽山越的出山，成为郡县农业编户小农产生的土壤，有利于土著地主的形成；此外，还有一部分山越人通过“给客”制度，成为如蔡敬则那样的庄园主的佃客、部曲和奴婢。这些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逐步形成，加速了浙闽社会从原始氏族社会跨过奴隶制度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转变，从而实现了浙闽社会制度跨越式的变型。这些是孙吴平定浙闽山越的主要功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 李墨西创办罐头厂

■马邦城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在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上，李墨西和弟弟翰西正倚靠在甲板的栏杆上，迎着扑面而来凉爽的海风，向遥远的东方眺望。旁边还站着好几位同船的温州同乡，他们都是胸怀救国图强之志、赴日深造的留学生。

李墨西（1880—1915），出生在瑞安原城关打绳巷，父亲李漱梅出身举人，曾任瑞安商会总理，生有四子，墨西为老大。这一年，在温处道台童兆蓉和乡贤孙诒让、黄绍箕等人的倡导与推动下，温瑞一带掀起了出国热潮，在父亲支持下，墨西、翰西两兄弟也加入赴日留学的洪流。他们抵日后，李墨西进宏文学院攻读食品制造，李翰西则就读于政法大学。

四年后，兄弟俩学成归国，李墨西先是在温州中学执教，不久，他毅然告别教坛，决定发挥自己所学专长，便和弟弟翰西一起，于1909年在家乡瑞安创办了太保罐头厂，这也是浙南地区第一家新式罐头厂。从此，李墨西踏上了“实业救国”这条艰辛的道路。

创业之初，困难重重，举步维艰。首先是资金匮乏，兄弟俩除倾尽家财办厂外，还以每股五银元向地方集资，共筹集七千银元作为启动开业的资本。没有场地，他们就因陋就简，选择城北河塘桥旁早已废弃的本寂寺作厂房。技术力量不足，他们引进日本罐头制造工艺，边干边摸索，还聘请两位日本技术员，作为生产技术的指导。为了节省资金，工厂除购进杀菌釜、制罐机等必要设备外，基本上都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自行制作其他附属设施。

最令人难堪的是，当时群众封建迷信思想很严重，认为借寺院办工厂会惊动神灵，招致不测；以牛羊肉做罐头原料，会造成杀生，带来灾祸。面对流言蜚语，不少人产生动摇畏难情绪，但李墨西坚信科学，顶住各种压力，终于力排众议，说服当地村民，坚持把工厂办下去。

太保的产品主要以牛肉、枇杷两种罐头为主，同时兼制羊肉、鲜笋、鱼翅、瓯柑、河鳗、凤尾鱼、麻雀、贻贝、涂蒜等罐头。牛肉罐头以温州本地黄牛为原料，引进先进的机械屠宰设备，屠后即将新鲜的黄牛精肉，横断切片，用祖传自制酱油与黄酒调味配制而成，肉细味美，口感纯正。

枇杷罐头的原料，则选自苏州洞庭山西山单核枇杷与杭州塘栖大红袍枇杷，这两样品种果大肉肥，核小味甜，为枇杷中的上乘佳品。购进枇杷后，先送至上海，再由海轮直运温州，最后用河轮运到瑞安，途中约三四天时间，正赶上枇杷充分成熟，糖分增加的时节，清洗干净后，即用太古糖和滴水岩泉水配制，使产品色香形味俱佳。

以上两种罐头质量可靠，美味可口，属太保罐头厂的拳头产品，一经上市，就受到上海、杭州及温属各县用户的追捧，不仅被用作佐餐佳肴，还成为交际馈赠的礼品，产品经常供不应求。有关方面还将其作为地方名牌产品进行推广，使它们在各地商品展销博览会上频频露脸，曾

相继获得南洋劝业展览会和巴拿马贸易赛会金奖，后来还获得过西湖博览会优等奖。

太保罐头厂的生产蒸蒸日上，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年产量最高时，达到2万听，生产工人也增至50多人，员工总数超过百人，可见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是当时温州一带响当当的食品生产企业。

在创办太久保罐头厂的同时，李墨西还引进日本石印技术，运用从日本带回的石印手架，在瑞安县城西山文昌阁创办了务本石印公司，成为浙南地区印刷工业的领头人。他们试制成功的彩色印刷招纸，用于罐头包装外贴，新颖别致，深受客户欢迎。后来公司搬迁至温州经营，改称务本印刷局，拥有2号石印机两台，对开石印大车一台，除印刷表格、商标、广告外，还承印《瓯海民报》、《浙瓯潮报》等业务。后来，务本印刷局还率先引进铅印技术，开启了浙南印刷业之先河。

正当李墨西的事业如日中天，大发异彩之际，他却因操劳过度不幸患上肺结核，当时这属不治之症。墨西虽知自己已身患绝症，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仍强支病体，奔忙在工厂车间，为罐头生产日夜操劳，终因病情过重，于1915年在瑞安病逝，年仅35岁。

李墨西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悲痛。瑞籍教育家洪彦远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好友张榈更是伤叹不已，题联挽之：

具绝人，干济奇才，游学返东洋，精印刷以开知，制罐诘以卫生，双方名利兼收，顿为瓯海商场大放异彩。

是我友，允宗令嗣，缔交由中校，谈风月而忘年，乐琴书而写意，八载云泥一别，忍使江村老朽哭尔英髦。

李墨西的墓地就在瑞安市郊沙塘“猫狸雷”，墓前嵌有一联：“山明水秀乡，日暖风和地”。站立墓前，远眺瑞安大地，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贸城市展现眼前。如今，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强国之梦已化为现实，作为浙南食品工业的开拓者，李墨西先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马知力画